

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的跨文化适应

马婷, 杨越

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河北保定

摘要: 双重身份认同是桥接社群的排他性文化资源, 也是中国留学生在异国文化适应的重要倚仗力量。本研究以马来西亚某公立大学中国留学生为对象, 采用扎根理论, 通过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 考察桥接群体在中国留学生马来西亚文化适应中扮演的角色。经Nvivo软件分析, 构建了桥接社群在其跨文化适应中的作用模型。模型显示, 同语言同文化背景是互动前提, 课程学习和社会交往是作用驱动因素, 能在生活、学术、社交上产生积极作用, 同时交往中的抑制因素及后续消极作用也不容忽视。

关键词: 跨文化传播; 桥接社群; 中国留学生

The Bridging Community and Inter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Oversea Student in Malaysia

Ting Ma, Yue Ya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Abstract: Dual identity is both a cultural resource that bridges the exclusivity of communities and an important reliance for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adapting to foreign cultures. This study takes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a public university in Malaysi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dopts the grounded theory, and uses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depth interview methods to examine the role played by bridging groups in the cultural adaptation of Chines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Malaysia. Through analysis with Nvivo software, a model of the role of bridging communities in their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is constructed. The model shows that the same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re the premise for interaction, while curriculum learning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are the driving factors, which can produce positive effects on life, academics,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hibiting factor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subsequent negative effects cannot be ignored.

Keywords: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ridging Community; Chinese Student

1 引言

田浩和常江两位学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提出了“桥接社群”的概念，认为海外华人是一个特定的桥接社群，其所具有的双重身份认同是桥接社群所拥有的排他性文化资源[1]。而笔者在对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的跨文化适应问题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也注意到了“桥接社群”是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重要倚重力量。

自21世纪以来，中国学生赴海外留学的人数持续增长，2018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已经到到66万多人[2]。中国留学生在海外的跨文化适应越来越为学术界所关注，然而对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倚重力量的考察却十分匮乏。

2 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后，留学渠道拓宽，公派和自费留学生人数整体上一是低龄化，二是热度持续。学界对中国留学生的研究逐步在多面向深入。例如对中国留学生在英国[3,4]，法国[5]，日本[6]，南非[7]，韩国[8]等不同国家跨文化适应状况的研究，以及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压力研究[9]等。然而，近些年来，一些非欧美国家也逐渐成为中国留学生的目的地，马来西亚就是其中之一。教育部出国留学政策调研组2012年发布了中国在马来西亚留学人员情况调研报告，彼时在马来西亚留学的中国大陆学生总数已达到约1.2万人，是马来西亚国际留学生中比例较高的国家之一。然而此次调研报告只着重解释了马来西亚吸引中国留学生的原因[10]，其他方面的问题不曾涉及。也有研究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大学的“留学跳板”效应突出[11]。

绝大多数关于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的研究都着眼留学生群体本身，留学生群体的有效沟通和跨文化适应过程充满了挑战：语言障碍是留学生学术适应中最为普遍的影响因素[12,13]，其他如教育模式[14]，文化模式、孤独、歧视[15]也是留学生在学术适应过程中面对的问题。然而，对于留学生群体在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倚重因素影响的考察却鲜有涉及。

Thomas等人将同时“内化”超过一种文化背景

的人称为“biculturals”（双重文化人），认为他们具有更高的跨文化传播效能[16]。Toomey探讨了双重身份认同及交际策略，提出了“双向摇摆双文化身份”模型[17]。基于这些研究，田浩和常江两位学者提出“桥接社群”概念，探索了桥接社群对中国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作用。然而数量庞大的中国海外华人和留学生群体都具有双重文化背景，但始终未曾被系统性地纳入由国家所主导的跨文化传播实践体系[1]。Vinokurov1等人注意到了社群在少数民族裔群体文化适应过程中的间接影响，少数民族裔社群对个体的跨文化适应既有积极促进的一方面，也有增加群体冲突、歧视的潜在危害[18]。留学生社交网络的研究是一个经常被忽略的议题，而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社交网络[19]，向朋辈寻求社会支持也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策略之一[20]。

本文基于上述理论和文献的理解反思，搁置对双重文化背景群体自身跨文化传播的探讨，转而探索这些具有“双重文化背景”的桥接社群——海外本土华人——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之所以要将桥接社群纳入中国留学生海外跨文化适应过程，首先是因为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当地华人是他们频繁发生互动的对象群体，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国家，华族占总人口的24%，约600万人[11]；其次，此上双文化背景的生成及发展是一种多层次、复杂、动态的生活体验，不仅涉及到多文化的沉浸，也涉及到与不同群体的互动交往。具体来说，本文通过对一个特定的桥接社群——海外华人——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考察，探索这一群体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所具备的潜能。作为中国留学生海外跨文化适应的重要倚重力量，探讨本土华人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可以成为具有理论潜力的探索路径。

3 研究设计

由于对桥接社群及其在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缺少成熟的理论框架可供选择和借鉴，因此本文尝试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这一议题进

行研究，以建构原创理论。近年来，马来西亚以其国际化英语环境和相对经济的费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中国文化与马来西亚主流文化虽存在很大差异，但马来西亚大量的华人群体，是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留学过程中频繁发生互动的群体。因此本文选取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探究在他们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马来西亚华人所扮演的角色。

本文采用田野调查和半结构式深度访谈的形式收集一手数据。深度访谈的数据收集方式是一种开放式的，更为灵活的，更倾向于关注人们实际经验的方式[21]，形式灵活的深度访谈能够促进受访者表达自己的观点，进而探索关于某个问题的详细信息，这种灵活访谈对话的进行，将鼓励受访者自由地提供他们故事的细节，从而为目前的研究收集更可靠的数据[22]。本研究是基于研究者笔者在马来西亚学习观察的基础上，选择了一所马来西亚公立大学的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选择这所公立高校，是因为这所高校地处马来西亚北部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但该校设有吉隆坡分校，因此可以兼顾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情况。受访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及访问学者，其中15位来自北方校区，5位来自吉隆坡校区，共进行了20位访谈，11位趋近数据饱和点，5位补充验证，4位饱和度检测。20位受访者包括1位访问学者，9位博士研究生（其中有两位的硕士学位也在马来西亚同一所高校获得），6位硕士研究生和4位本科生。从受访者的年龄分布来看，有12位受访者年龄介于20到19岁，有4位受访者年龄介于30到39岁，有4位受访者的年龄介于40到49岁。在这些受访者中，有8位受访者在马来西亚的时间少于1年；有4位受访者在马来西亚的时间不足2年；有5位受访者在马来西亚的时间不足3年，有2位受访者在马来西亚的时间不足4年，另有1位受访者在马来西亚的时间最长，超过5年时间。在这20位受访者中，10位受访者已婚，其中5位受访者的孩子均在国内，另有2位受访者的孩子在马来西亚随读。所有访谈以汉语进行，主要围绕以下问题展开：（1）受访者在马来西亚留学过程中主要的交往群体及交往情境；（2）受访者在留学过程中

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会得到哪些人的哪种帮助；

（3）受访者对交往经验的评价。

在数据分析方面，本文遵循扎根理论的一般性操作程序，借助Nvivo软件，对所获得的原始文本数据，经过开放式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三级编码程序进行分析（见表1），发展出“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作用模型”，（见图1）。这一模型所揭示的主要关系为：（1）桥接社群的类别可分为组织机构型和个人两大类。（2）课程学习和社会交往是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互动的驱动因素；（3）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互动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客观机主观抑制因素。（4）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互动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产生一定的消极作用，对双方进一步互动产生相应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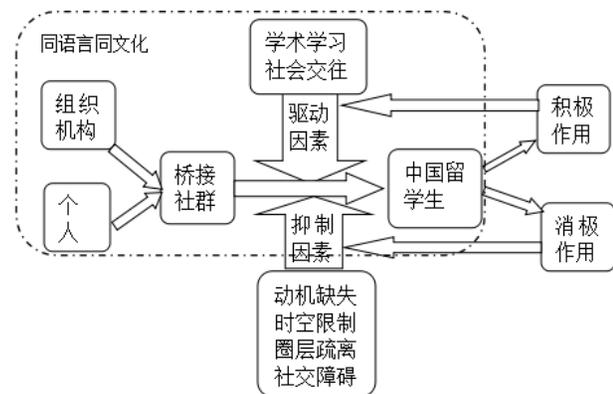


图1. 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作用模型

4 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作用模型阐释

经过以上扎根理论数据分析，本研究发现，所有受访者在留学中都非常倚重桥接社群，受访者主要通过课程学习和社会交往与不同的桥接社群发生互动，这种互动对中国留学生产生积极作用的同时也产生一些消极作用，与此同时，在这种互动的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抑制作用。结合部分原始资料，本文对这一作用模型进行详细阐释。

4.1 桥接社群的类别可分为个人和组织机构两大类

本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在学习生活过程中，

表1. 编码表

主范畴	对应范畴	概念	文本语句	
群体类别	个人	华人学生	其实我接触当地人也是接触华人，因为吉隆坡校区华人学生很多。（1） 有一次假期，中国学生都回国了，有个华人朋友觉得我挺孤单的，就带我回她家。（5） 跟当地人接触主要是跟当地的华人接触的比较多。（7） 我的房东就是华人。（1）	
		房东	房东是华人，交往都没有问题。会约着一起出去吃饭，一起出去玩。（2） 我的房东是马来西亚华人（6） 我出门经常叫那位华人大叔的出租车。（14）	
		出租车司机	我在脸上叫出租车，专门找华人出租车司机，觉得靠谱（3） 我认得一个华人出租车司机。我留着电话经常有事就叫他，他很守时。（20） 我们宿舍收费的问题，都是学生会和学校交涉才给解决的。学生会还是有话语权的。（9）	
	组织机构	学生会	刚来的时候，学校几乎没有有什么新生入学指导，是中国学生会的人帮我们很多。（11） 我们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是关于护照和签证的，中国学生会会尽力帮我们，我觉得中国学生会作用很大，他们会重视我们的问题。（12）	
		同乡会	我们家里是有客家人背景，客家人的老乡情很重，我在这边找到了同乡会。（2） 学校里面有马来语辩论和英语辩论，我们参加的这个是华语辩论。（6）	
		社团活动	我加入了学校的华语辩论社，认识很多华人朋友。（7） 我和很多华人朋友一起帮他们筹办国际文化节活动。（9） 学校的健身房，有学生卡就可以进去，我们经常约着一起去健身房健身。（10）	
	社会交往	体育运动	打篮球的过程中也会认识华人朋友。（11） 我参加学校的乒乓球社团，这个社团以华人为主，我们经常一起打球。（12） 我经常去学校超市买东西，那个老板是华人，有时候也会一起聊聊天。（13）	
	驱动因素	经济活动		我们在集市上，会遇到一些华人商贩，他们会跟我们说一些当地的情况。（16） 我经常租叫那个华人出租车出去购物或者办事儿。（19） 马来华人学习特别好，我们上课遇到什么问题都找他商量。（10）
			课程学习	这个马华同学，我们上一样的课，有问题就一起解决。（14） 在功课方面遇到的问题，经常找马华同学帮忙。（18）
		学术学业		那个华人学姐，她比较有经验，然后在学术写作方面跟她学了很多东西（4） 做论文的时候，跟华人朋友交流，比较容易掌握这边的学术规范。（5） 她是我们这个专业的博士生，会跟我告诉我一些国际学术会议的信息，会交流论文写作和论文发表的经验。（19）
解决难题			因为我要去修车，主要也是去华人的修车店去修。（10） 我们会去找华人餐厅，有面条、饼之类的。（11） 陕西人对面食的感情，是难以割舍，华人同学给我送过一包挂面，那一包我一顿就吃完了。（12） 那个华人学姐给我讲了很多搜索文章的渠道，还有免费下载的渠道。（4）	
作用面向	积极作用	学术支持	我们研究所里有一个马华，他们对他们的教学体系也了解，他会告诉我们从什么角度去做作业更好。（14） 在功课方面遇到的困难，也是室友之间相互解决，关键是幸亏室友英语底子比较好。（18） 人比较低谷时就会跟她们聊聊天吃吃饭，完了就心情好啦。（8）	
		精神纾困	因为延期毕业情绪低谷，就跟我华人朋友一起就想办法吃好喝好玩儿好。（12） 假期的时候就请华人朋友介绍华人旅行社出去玩几天，放松一下。（15）	
	消极作用	减缓学术适应	所以我朋友怪我，说我英语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天天跟说中国话的人在一起。（8）	
		信任危机 精神歧视	中介骗了我，他故意把那个价格给改了，他是个华人，这件事会让我心存芥蒂（2） 那些成绩好的华人对中国人格外歧视。（6） 我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4）	
客观因素	时空限制	后来他跑到小镇租房住去了，小镇离学校远嘛，我们之间就再没机会交流了（11） 没有太多社交，相对来说比较忙，因为作业比较多（14）		
	圈层疏离		实际上，华人，马来人，中国人，各自有各自的圈子。（12） 工作站里都是国际学生，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机会认识当地华人（20）	
			当地华人的一部分学的成绩是顶尖的，就会非常看不起其他人，所以也不会跟我们交往。（6） 我很享受现在这种轻松的生活，我不用带孩子，而且不用上班，我就只要学习，我很享受，不太喜欢跟人交往（8）	
抑制因素	主观因素	动机缺失	我是一个特别不喜欢社交的人。（7） 我不是一个很爱社交的人（14） 因为社交恐惧，所以不喜欢社交（7）	
		社交障碍	我差点被退学。那段时间整个人消沉到一个极点，整天睡觉，不想见人。（11） 那段时间，非常抑郁，不想跟任何人交往，只想一个人呆着。（20）	

主要与桥接群体发生各种形式的人际互动，交往互动的桥接社群主要有：当地华人学生、华人房东和华人出租车司机。他们之间发生互动的缘由，就如受访者所说“华人毕竟以前是中国人过来的，差异就没那么大，而且语言上交流更方便，就会接触的更多一些。”，“因为中国是他们的祖籍和家乡，他们就会对你很好。”由此可见“说汉语的群体”是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互动交往非常频繁的群体，而文化同源，历史同根是当地华人愿意与中国留学生交往的根源。专门找华人房东，华人出租车司机，都是中国生在陌生环境中的应急反应，但这种良好互动能够促进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如受访者所说“遇到的华人房东也超级棒。可能大概每两个月我们都会一起出去吃饭呢。”“我专门找华人出租车司机，觉得靠谱，容易交流。”由此可见，当地华人是留学生交往的重要群体，而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是他们发生互动的前提。

中国留学生互动交往的“同语言的桥接群体”在他们跨文化适应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同语言的桥接群体”的存在验证了语言障碍是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中最为普遍的影响因素。虽然中国教育系统中，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是一门重要课程，但中国学生的英语听说能力普遍比较薄弱，口语交际能力也较差。因此，中国留学生要迅速适应当地生活，“同语言的桥接群体”就成为他们重要的倚重力量。

4.2 学术学习和社会交往是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发生互动的作用媒介

作用媒介意指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发生互动交往的具体方式和渠道。本研究发发现学术学习和社会交往是其主要方式。一方面中国留学生赴马留学目的清晰，学术学习是其主要日常活动；另一方面受到马来西亚持学生签证不得务工的政策限制，中国留学生的社会交往活动依然围绕学业展开。

在学术学习方面，中国留学生在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中较多与桥接社群发生互动。在课程学习的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首先涉及到的是马来西亚和中国教育体制差异带来的课业完成困难。马来西亚高校教育非常注重过程性考核，小组作业多，课堂多

元文化特征明显。从理解老师的作业要求，到与各种文化背景的小组成员沟通交流，共同完成作业，对中国留学生来说都是很大的挑战。如受访者所说“我的老师会要求中国人不要在一组，要分开，所以就和其他马来人、印度人或者其他国家的学生一起做小组作业。马来人的英语也不是特别好，口音还很重，要是遇上非洲学生，更是口音重到说英语也听不懂。”此时，华人同学成为他们完成课程学习非常重要的倚重力量。“我认识一个华人，学习特别好，和我们选的课基本都一样，上学期在一块儿，这学期也在块，关系也很不错，我们遇到什么问题都找他。”可见，虽然中国留学生在课程学习方面遇到的困难主要是因语言沟通问题带来，但桥接社群加快了他们在学术体制层面的跨文化适应过程。

中国留学生在学术论文写作过程中，因中国严格的网络媒介治理，诸多国际网站都不能使用，而缺乏使用英文网站，获取英文学术资源的经验。在马来西亚，高校的学术活动和学术研究十分依赖谷歌学术，脸书，YouTube等媒体，通过谷歌学术网站获取大量专业学术论文，通过脸书同类研究群组获取学术活动的资源，这些在国际学术界通行的做法，中国留学生却显得经验匮乏。此时桥接群体发挥积极作用，如受访者所说“那个华人学姐，给我讲一些搜索文章的渠道，还有免费下载的渠道”“她会跟我告诉我一些脸书同类学术圈的群组，那个上面会发很多国际学术会议的信息”。显而易见，桥接社群加速了中国留学生在学术层面的跨文化适应。

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的社会交往对留学生生活层面的跨文化适应起到了积极作用。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区的社会交往主要通过社团活动，体育锻炼和商业经济活动展开。以华人为主的社团成为了其互动的重要媒介。如受访者所说“我参加了华语辩论社团，觉得这个社团挺好的。”“我参加了辩论社，创办人是马来西亚华人，现任的主席家在槟城，我们去槟城玩儿就住他家里。”体育类社团多是男生参加，也多是男生通过锻炼赛事与华人交往，但在整体上参加社团的仍是少数。日常商业

经济活动中，受访者广泛接触到各类的当地华人，包括房东、商贩、出租车司机，因留学生生活轨迹相对确定而频繁交往。无论是地处偏远的北方校区还是地处繁华的吉隆坡校区，中国留学生都倾向与华人租户、商贩等对象交往，遇到问题也倾向找华人。“修车，也主要是去华人的修车店去修。”中国留学生与当地华人桥接社群的互动往来，促进了中国留学生异国他乡的生活和学习的方式的转换和适应。

马来西亚社会广大的华人群体，在中国留学生的学习和社会交往各方面都成为其跨文化适应的倚重力量。

4.3 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的交往互动产生积极作用，但亦有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

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的互动交往，虽绝大多数限于读书学习过程，但在生活和学术的跨文化适应中也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偶尔产生一些消极作用。

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的交往互动产生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桥接社群能够帮助解决诸多生活难题，如饮食差异，所有的受访者都提到了这一点。马来西亚属于热带地区，主食米饭，菜品普遍含有咖喱，而中国只有部分地区以米为主食，绝少使用咖喱。因此，很多受访者会因食品类似中国特意去华人餐厅吃饭，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留学生普遍存在的饮食挑战。而如住宿、租房、修车、签证等生活问题他们也都倾向于寻找当地华人帮助解决。有一位受访者，带自己的孩子求学，在为孩子寻找当地合适的学校学习的过程中，遇到的择校、签证等问题都是华人朋友帮助解决。二是桥接社群能为中国留学生提供一定的学术学习支持。中国留学生在马来西亚学习，面临着学术模式的转换，当地华人学生能帮助中国留学生快速熟悉马来西亚高校的学术模式，获取学术资源，掌握功课技巧。三是桥接社群能帮助中国留学生缓解精神压力。中国留学生心情低谷时，会约着华人朋友一起吃吃喝喝、一起旅行进行纾解。这些积极作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留学生在跨文化适应

过程中的困难，促进了其跨文化适应。

桥接社群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消极作用虽不具普遍性，却反映了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由于双方有着共同的语言——汉语——做交流媒介，使得中国留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得不到充分锻炼，不仅减缓了中国留学生的学术适应，也影响了中国留学生与马来西亚其他社会群体以及国际社会的沟通和交流。在交往过程中也偶有发生商业欺诈和歧视问题，有一个受访者说到华人学生的歧视现象，让人印象深刻。“特别是成绩好的那些当地华人，他们在高中的时候成绩非常优异了，到了大学以后他们的成绩还是顶尖的，然后就会非常看不起其他人。他们瞧不起中国人，也瞧不起马来人，都瞧不起，他们是瞧不起成绩低的人，但是他会自然地把中国人都归纳到那些成绩不好的人当中。”虽然这些只是偶然现象，但也使得中国留学生对华人群体产生不良印象而影响进一步交往。

4.4 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互动中存在不容忽视的客观及主观抑制因素

本研究发现，中国留学生在与桥接社群互动的过程中，存在一些抑制交往的因素，经过分析，这些抑制因素可以分为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两大类，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留学生的生存状况，而主观因素则映射出中国留学生的精神状况。

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互动的客观性抑制因素主要是时空限制和圈层疏离。在马来西亚，他们需要应对学习生活调适、教育体制转换及课业压力，所以多将时间精力投入学业，无暇顾及及其他社交。如受访者所说“如果我不选五门课，我就要读四学期了，我不想。我想早点完成学业，就选了五门课，所以，有那么多quis，还有那么多作业，还有那些论文要写，我就每天在图书馆，晚上八九点才回宿舍。我的时间都用来学习了。”除了时间，居住地变化形成的空间阻隔也抑制着双方的交往。受访者所在高校远离市区，原先频繁交往的华人学生若离开校园，改住市区，交往就会受到空间限制而渐渐疏远。

圈层疏离是很多中国留学生都能感受到的马来西亚社会现象。马来西亚是个多民族多文化社会，马来族、华人、印度裔作为三大主体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马来族说马来语信仰伊斯兰教，掌握国家政治主权，马来语为官方语言；华人讲汉语（多为粤语、闽南语），多信佛道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宗教，对马来西亚经济有很大影响力，英语是马来西亚主要的商业语言；印度裔，信仰印度教，说泰米尔语，政治经济地位和影响力都不及马来族和华人。马来西亚社会整体上虽体现出和而不同的样貌，但族群关系却暗潮汹涌。“实际上，华人，马来人，中国人，他们各自有各自的圈子。”一位受访者表示，“读博一年多，没有遇到一个华人老师，但自从认识了内地来的一位访问学者，借着她的华人导师，就认识了几位华人老师，好像空间穿越一样。”圈层疏离现象根源于马来西亚的社会历史文化，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亦能为中国留学生感知和体验，成为影响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交往的客观抑制因素。

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互动过程中的主观性抑制因素可以归纳为动机缺失和社交障碍。中国留学生与桥接社群的互动主要是人际交往，这种交往完全建立在自愿、平等基础上。因此，一些留学生因个人性格“不喜欢社交”“不喜欢跟人交往”而缺乏主观交往意愿。如有一位已婚的女性受访者，家人孩子都在国内，她表示“我很享受现在的生活，我不用带孩子，不用上班，就只需要学习，多幸福的一件事情，我很享受这种单纯轻松的生活，我不太喜欢跟人交往。”这在一定程度折射出中国已婚女性的生存状况，中国女性全面参与社会生产，同时承担照顾家庭、哺育孩子的家庭生产，脑力体力劳动的付出普遍超出中国已婚男性。当她们有机会跳出辛劳的生活状况，便非常享受看似单调的学生生活，不愿意有不必要的社交。当中国留学生的主观交往动机缺失，与桥接社群互动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

社交障碍也是抑制中国留学生在与桥接社群互动的主观因素。这些社交障碍可能是偶然性事件造成的短期问题，也可能是心理因素形成的长

期问题。例如受访者表示“因为连着两个学期的GPA（平均学分绩点）没有过2.0。差点被学校退学，那段时间整个人消沉到极点，整天睡觉，不想见人。”这是短期问题引发中国留学生的短期社交障碍，随着问题的解决，会逐步得到缓解。然而有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是一个确诊的“抑郁症患者”。这位抑郁症患者表示“我有社交恐惧症，不是那种大家随便说的社交恐惧，是那种站在人前，我就会特别局促不安，我会心悸，然后直接蹲在地上头晕说不出话的社交恐惧……在这两年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我都不曾向外人求助过。我都是一个人做事，一个人出去玩儿。”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这位留学生的抑郁症主要由家庭因素产生，且从中学起就频繁发生抑郁症发作而自残的现象。这些心理问题，并没有引起其父母的重视，在高度依赖自我管理的马来西亚高校也很难得到有效的援助，非常明显地抑制了与桥接社群交往的可能性。

这些客观性或主观性抑制因素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留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留学生群体精神面貌的差异性，都极大影响了中国留学生群体与桥接社群交往的可能性。

4.5 结论：海外华人是推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重要倚重力量

本文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扎根理论方法，发展出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作用模型。以此模型为基础，本文归纳出如下结论。

桥接社群所具有的双重身份认同是桥接社群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产生作用的根本性因素。马来西亚当地华人作为早期的中国移民的后裔，依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并在他们的饮食、文化等方面有深刻体现。而在马来西亚成长的过程中，又内化了马来西亚当地文化。因此他们保有的中国文化传统能够让他们比较容易地与中国留学生建立关系，发生互动，帮助他们熟悉当地的社会文化。

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群体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是双方互动网络的驱动因素。马来西亚当地华人多为中国南方广东福建等地早期移民

的后裔,他们在马来西亚的交流语言多为闽南语和粤语,但他们也可以用普通话与中国留学生进行交流。共同语言和共同的文化传统,使马来西亚华人与中国留学生之间很容易确立一种彼此的熟悉感,从而增进双方的理解和沟通,促进更频繁的社会交往。

桥接社群对中国留学生群体的跨文化适应过程所具有的积极作用应予以重视。

田浩和常江两位学者提出了桥接社群的概念,认为应该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给予更加充分的重视,并且围绕这一群体展开理论的建构。而本研究通过桥接群体与中国留学生的互动来考察桥接群体在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角色,并建构了桥接社群与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的作用模式。本研究发现桥接社群群体对中国留学生跨文化适应过程中,在生活适应、学术学习,精神纾困等各个层面上都起到积极的作用。本文通过实证的研究,验证了桥接社群对海外中国群体的跨文化适应重要价值,本文认为桥接社群这一重要价值应该予以重视,这对于中国数量庞大的海外侨民群体,在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过程当中发挥积极作用有重要意义。

致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少数民族女性新媒体赋能研究”(项目编号:20BXW09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 [1]田浩,常江.桥接社群与跨文化传播:基于对西游记故事海外接受实践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27(01):38-52+127.
-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China's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in Chinese)[EB/OL].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M0A&sj=2018,2025-07-20>
- [3]贺平,唐洁.中国留学生在英国经历的文化冲击现象分析[J].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3):83-86.
- [4]张晓梅.中国留学生语言焦虑状况调查与分析——以胡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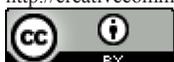
- 汉顿大学中国留学生为例[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6(06):31-36.
- [5]金闪闪,郭凤英.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能力与适应性研究——以中法合作学院留法工科硕士生为例[J].现代大学教育,2018,(03):94-102.
- [6]徐琼.在日中国留学生异文化适应的社会人类学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4):124-128.
- [7]陈凤兰.中国留学生在南非的跨文化冲突与适应[J].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6(06):75-79.
- [8]崔金海.在韩中国留学生学校生活适应研究[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2,31(05):67-71.
- [9]吕催芳.中国在美留学生心理和社会文化适应质性研究[J].教育学术月刊,2017,(05):3-13.
- [10]教育部出国留学政策调研组.中国在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三国留学人员情况调研[J].世界教育信息,2012,25(02):65-70.
- [11]周玉红,张应龙.当代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留学生的主要特点[J].东南亚研究,2007,(01):68-71.
- [12]阎琨,David C Berliner.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师生互动压力:以美国某大学为例[J].复旦教育论坛,2011,9(01):77-82.
- [13]Mori, S. (2000) Addressing the mental health concerns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s. *Journal of Counseling and Development*, 78, 137-144.
- [14]Fun, S., Yue, Y. (2009) Multicultural learning experiences of Chinese - background students at two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Paper presented at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Australian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Conference (Canberra).
- [15]Zurita1, Baloian, Pino, Peñafiel. (2016) Support Communication and Intercultural Adjustment of Exchange Students Based on the AUM Theory.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50-64.
- [16]Thomas, D. C., Brannen, M. Y., Garcia, D.(2010) Bicultural Individuals and Intercultural Effectiveness. *European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Competence and Management*, 1, 317.
- [17]Toomey, A. (2013) Bicultural Identity Negotiation, Conflicts, and Intergroup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Research*, 42, 112-134.

- [18] Vinokurov A, Trickett, E.J., Birman D. (2019). The Effect of Ethnic Community on Acculturation and Cultural Adaptation: the Case of Russian-Speaking older Adult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2020)21, 105-1081.
- [19] 汤林芳. 从人际圈的角度分析海外中国留学生的跨文化适应[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 [20] 史晓婷, 霍祥湖. 中国留学生群体朋辈支持体系需求分析及启示[J]. *科教导刊(下旬)*, 2018, (18): 167-169.
- [21] King, N. and Horrocks, C. (2010) *Interview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SAGE Publication Ltd. London.
- [22] Edwards, R. and Holland, J. (2013). *What is qualitative interviewing?*. Bloomsbury Academic. London.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Global Science Publishing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